

《新列国志》中的“借言作断”之法

彭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长沙 410205)

摘要:冯梦龙在《新列国志》的创制过程中,发挥《左传》“借言作断”之法;一方面,将春秋义理融入人物话语,明白显豁地反映历史真相,寄寓是非论断;一方面,借鉴《左传》中“君子曰”的模式,以髯翁、髯仙、史官、史臣等身份进行讽咏,或出以己意,或引经据典,以有诗或无诗的评论,增加内涵与意趣。他力图经史融合,藉由小说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大众教化,提升了列国小说的品格,确立了《新列国志》在列国小说演进过程中的典范意义。

关键词:冯梦龙,《新列国志》,人物话语,史论史评

中图分类号:I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5-0050-06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505

列国小说取材于经史合体的《春秋》经传,儒家经典本身的庄重与权威属性,决定了对其进行通俗化的处理需要慎之又慎。冯梦龙在余邵鱼的底本上创制《新列国志》^[1],要提升列国小说的品格,离不开其出入经史的基本功。《左传》传经往往借记言来叙事,进而臧否人物、评论是非,常于人物话语中包含论断,或借“君子曰”、他人评论来进行价值评判,可称之为借言作断。冯梦龙发挥此法,贴合经传义例与书法,借助得体的议论与叙述,既会通经传褒贬意义,又符合作者的感情倾向,还吻合于小说中人物的身份与语气,史事与义理因而相得益彰。他以春秋学素养为依托,提升了历史演义的品格,方确定了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在列国小说演进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典范意义。

一、人物话语为断语

《新列国志》中常借历史人物现身说法,将春秋经传义理融入人物话语中,以期明白显豁地阐释史事,寄寓是非论断。冯梦龙巧妙通过人物自我叙说来兼顾前情,对于事件加以精当概括。这些概括有的是基于史事背景、时局分析。第五十九回,楚公子壬夫为楚王谋划伐宋,指出宋国介于晋吴之间,扰乱晋国要从宋始;晋如果不救宋,将失信于诸侯;救宋必攻五大夫,可以坐观其成败。其以叙战进行背景分析、悬念设置。而有的对人物经历的综合把握。如狐偃向重耳坦言自己有“三罪”:一罪为当初使公子困于五鹿,二为受曹卫二君之慢,三罪为乘醉出公子于齐城,借此强调“圣臣能使其君尊,贤臣能使其君安”的道理。

收稿日期:2020-02-02

作者简介:彭娟(1980—)湖南常德人,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湖南第一师范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明清小说,明代科举文学。

基金项目: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YJC751031)。

借助人物对话可表现不同的立场,呈现多重意义空间,比较典型的有议战模式。郑国地处中国枢纽,晋楚争霸必使郑国诚服之,郑国多年为求自保朝晋暮楚,伐与会宛如儿戏。《左传》襄公九年到十一年重在传事,未能清晰明确地回应经义。小说六十与六十一回在表现这段史事时,以郑简公与诸大臣谋划议战揭示了郑国淪盟的不得已:晋强于楚但不能败楚,使郑免于侵扰要激怒晋楚对决。另一方面,晋国也在谋划败楚服郑:荀罃向晋悼公献三驾服楚之策,令楚军让霸于晋,令晋国不战而胜。《公羊传》注意到萧鱼之会前伐郑都没说结果,与前盟相比萧鱼之会的效果完全不同了^{[2]70};《谷梁传》认为此会后郑不再背盟,公以自会告庙表示以德服郑:二解互为应照可得经义。程颐曾指出:会于萧鱼,郑又服而请会,但经文不书“郑会”是认为郑不可信。小说借晋悼公面对柏骢行成时的质疑指出:晋以诚信待郑,若再怀反复将犯诸侯公恶,指责郑以会盟为缓兵之计。胡安国认为:晋悼公能至诚待人、信郑不疑,才赢得了郑国不复背盟二十四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驾而楚不能与之争,城濮之战的效果也难以超越。^{[3]236}小说为突出这层意义,以萧鱼之会上晋悼公对郑简公的言辞表现了至诚胜兵戈的意义,悼公开诚布公,表示愿意礼囚放归、遣告诸侯、禁止侵掠,尤其是不顾各诸侯的劝谏,撤去虎牢关的戍兵,令郑自为守望,是信任郑国不作防范;同时,借其叙述说明:虎牢戍兵令诸国将士长久劳苦,这也是相与休息的了局;“从晋从楚,出于尔心,寡人不强”的一席话,有对于小国苦兵的深切理解与反思,终于赢得郑简公的心悦诚服,从而说明洞悉战争规律与忠信服人之效。

预言模式中,人物根据人事端倪或特殊情状来预测成败吉凶,梦寐、歌谣、谶纬、人相、物象等等,多未尝离人事而言天道,预言中已包含历史经验与是非论断。第四十八回,赵盾上台后驱逐了正卿狐射姑,欲斩杀先都、箕郑父二卿及士穀、梁益耳,蒯得三位大夫,借襄夫人之口否定其杀同僚的做法:几位为争权而非篡逆,罪有首从,不能一概诛杀,否则朝堂之位空缺,老臣之士凋丧;并以狐射姑之口指出盾如“夏日之日”,酷烈可畏,也预示着赵氏专政的开端,日后势必凌驾于君权。第十九回叙鲁庄公娶哀姜,尽行奢侈以取悦对方,派去纳币的大夫与宗妇一概用币,大夫御孙私叹: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彰显身份。女贄不过榛栗枣脩,以示尊敬。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今男女同贄无别,国之大节由夫人而淆乱,大概难以善终。后哀姜因为弑君而被讨,果如其言。预言的时机或在正式行动之前的整体性预见,与事件的结局与经验教训互相照应。如秦晋崤之战前,蹇叔与百里奚劝谏秦王:劳师以袭远,劳而无功,中途易生变,非仁非信,成功之利小,而失败之害大,是非智之举。这三方面之失是对出兵合理与否的恰当分析。蹇叔与百里奚劝谏无果后,还有哭师之举,已预知秦军大败,并以小说笔法叙蹇叔安排下善后之计;而借助王子虎与王孙满观秦军超乘,意味深长地从旁观者的角度表现出秦军此行蕴藏隐患:按礼,御车武士过天子之门,必卷甲束兵下车步行。而秦军仅仅免胄,已是无礼;争先跳跃上车,更显轻狂放肆。轻则寡谋,无礼则易乱。这是借人物的议论侧面地补充了某种视角,呈现了镜鉴的意义。

在人物命运盛极之时,以智谋之士的警策之言指明危机,预示命运走向的同时,也是对人物的综合评价。第八十九回,当商鞅荣宠在秦国到达极致时,上客陈良的告诫便包含了对变法之失的评价:“法令虽行,刑戮太惨,民见威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太子恨商君刑其师傅,民间父兄子弟久含怨心,孝公在世尚可平衡新旧势力的博弈,待去世必有性命之忧。商鞅后被新君嫉恨、被旧贵族党羽诬告,被捕后车裂、灭族,如其所料。小说写商鞅分尸后,百姓争啖其肉,须臾而尽;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表明仅靠严刑峻法施行富国强兵之捷径,仁义不施导致人心背离、作法自毙。这些人物断语往往着眼于道德品质的评价,作为政治走向、人心向背、个人命运的依据。商鞅的诈伪与刻薄,冯梦龙显然并不认同,但他并未以道德评价代替历史评判,商鞅当初以伯业说秦君时便下过断语:“伯者之道,必逆民情。”要在羸弱的秦国以暴力施政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变法实效的同时必然要受其反噬。商鞅告归时,有人向秦惠王进谗:“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秦国妇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不言秦国之法,可见权倾国君是惠王最担心的事情,惠王要除去商鞅的根本原因还是忌惮其权力太大,担心他会以臣欺主,终将谋反。这样的断语说明,商鞅之死在性格悲剧外,有政治与时代因素使然。

二、史论史评定褒贬

《新列国志》中借鉴《左传》中“君子曰”的模式,以髯翁、髯仙、史官、史臣等身份进行讽刺、评论、感叹,按形式可分为有诗的评论与无诗的评论;以内容出处而言,可分为引用前人或经典的评论,以及出以己意的评论。

(一)有诗之评

小说中的诗作多为“出己意、发议论”的史论类型,用意隐然得体。在《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4]中,大多数引诗署名为东屏先生及潜渊居士所作^{[5]207},而在《新列国志》中已大量删减,以潜渊为名义的诗评缩减为20首,东屏先生的诗仅1首。《新列国志》中有诗为证式评论主要为托名髯翁的咏史诗,约为100首(因在上下文语境中,在并列几首诗的情况下,前文虽有托名,但“又有”某诗的表达,其主语可以理解为托名者、或未知名者,难以指实),以髯仙为名义的诗评为35首。根据小说中针对史实量身打造的诗作来看,髯翁、髯仙更有可能是冯梦龙的自称。明代以髯翁为号者,有明中叶的徐霖(1462—1538年,一说1473—1549年),不能完全排除他作为前辈同乡对冯梦龙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潘之恒(1556—约1622年)中年曾寓居南京、苏州,与汤显祖、沈璟、凌濛初等交好。冯梦龙不仅从潘之恒处吸收借鉴了戏曲表演理论,而且《情史类略》的编撰也受到了《亘史》的影响。也有论者以为陇西居士也是冯梦龙的众多化名之一^{[6]5},小说中以陇西居士名义的咏史诗有6首。

髯翁、髯仙的咏史诗具有浓郁的感情色彩。小说中几乎每一回都有髯翁的咏史诗,其咏史视角主要着眼于纷扰历史中人的选择与相应的意义和影响。诗中议论常有翻新奇崛处,如咏徒人费和石之纷如死难事,并未迂腐地赞赏他们捐生殉主,而是冷峻指出他们受桓公私恩、从于昏乱,虽视死如归,还是不算忠臣,仍然大节有亏。六十五回,他就州绰、邴师为齐庄公殉难事再次指出:“私恩只许私恩报,殉难何曾有大臣。”髯翁也常感性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心性、品质与情怀。第十回中以古风形式赞叹:管仲治国之才,叔牙知人之明,桓公用人不疑,君臣朋友,千古难见。在咏专诸事时,亦顺带言及伍子胥“刚直人推伍子胥,也因献媚进专诸”。对《左传》中的观点也未苟同,如第八回论郑世子忽不愿结亲于大国,执意辞婚,称赞其“丈夫做事有刚柔,未必辞婚便失谋”,并以鲁桓公的悲剧为反证,有警策效果。他常不以成败论英雄,推崇忠义君子,羡慕君臣合德的理想。

髯仙相比髯翁更见率性,有嬉笑怒骂之态。其咏史诗常以对比格局呈现人事的意义,有警拔峭折的语气。五十五回咏宋华元暗夜独行于兵甲丛林般的险境,终于潜入地方将领的床前,以雪亮匕首威胁公子侧,不惜玉石俱焚来议和,竟然因为彼此坦诚结为兄弟。暗夜独行与片语订私盟形成极大的反差。七十六回讽咏囊瓦时抓住两幅画面:一个是披裘佩玉乘名驹的平日做派,一则为贪功侥幸导致失败后卸下袍甲、乘车奔逃的仓皇身影,把贪夫的形象漫画式凸显出来。九十八回,赵人以四十万大军之众选择投降,最后被秦将坑杀。他感叹匹夫有志尚可勇武一斗,以善战闻名的赵人若能有志殊死相拼,定不会有如此惨祸。第一百回感叹信陵君养客数十年,而“食客三千无一用,侯生奇计仗如姬”,形成讽刺效果;而且魏王畏敌少勇,与信陵君仅凭与平原君的交情便欲干犯强秦,无益于轻率捐生,二者并观,形成辩证视角。他特别赞赏权变,对于小白中箭急中生智非常赞赏,认为光凭这点“便知有智合诸侯”。这与冯梦龙在《智囊》等书中表现出对计谋、胆识的崇尚态度是相通的。他对于非常之志、非常之人总会多些怜惜。三十二回他叹齐桓公一生英雄,到头没些结果。对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不吝赞词。如七十三回,他推崇为成就儿子忠臣之志而自缢而死的专诸老母,再反观世间芸芸众生为贪生而误,多有不及。

《新列国志》中以“史臣”为名义的诗98首,以“史官”为名义的诗约为42首。一般而言,史臣和史官的诗评与髯翁或其他咏史诗的诗评互相交错,从而形成对史实和人物的多角度评价。相比髯翁的诗评,史臣和史官的诗评多通过理性分析指出历史的真相和事件的性质。史官与史臣推尊天道、王道,推尊良知和正义,崇尚礼仪和信用,讲究夷夏之辨,讲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伦理纲常。多以历史的观察者身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敏锐眼光指出政治的兴亡迹象。如第四回指出:“一从秦鲁开

端僭,列国纷纷窃大权”;第五回指明周郑交质意味着君臣之分已尽,“王纲陵夷”。其俯察人事,监督权力,提炼政治智慧,特别重视揭示反面教训,如第五回卫庄公宠吁致乱,反思“教子须知有义方”。第三十四回,分析宋襄公之失为“无端媚楚反遭殃,引得睢阳做战场”。也常常直指人心,深诛其意。第二十三回分析管仲不早救邢卫,是图霸者养乱为功之谋。第十回讥刺祭足宠辱之间易受惊,不能拼死做忠臣,致宋人相轻。也有驳斥《左传》中的观点,第十九回叙鬻拳曾两次强谏楚文王,第一次是以兵谏阻止楚王烹杀蔡哀侯姬,之后自断足以谢罪,第二次他闭门不纳溃败回国的楚王,激楚王伐黄以雪耻,楚王薨后自刭而死。《左传》称鬻拳“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可谓爱君,小说则借史官议论驳斥:“谏主如何敢用兵?闭门不纳亦堪惊。若将此事称忠爱,乱贼纷纷尽借名。”很能代表宋明以来从经义理解的角度,如宋人吕大圭就以此为例,指出《左传》于君臣关系上义理不纯粹^[7],这正是旧时学者常常不满的地方。

在具有叙事意义或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去世时,小说总会以史官、史臣的名义以四言赞体总评其一生得失与历史功绩。这种四言韵语的评论是借鉴了纪传体的史赞形式。在六国相继为秦所灭时,也以史臣的四言史赞叙诸侯国的世替,并以《列国歌》收结。《列国志传》中以史臣名义的赞诗并不局限于四言,还有五言形式,偶尔还借用刘向的四言颂辞进行评,但使用频率并不如《新列国志》。

小说中有署名胡曾的咏史诗为28首,还零星点缀有唐人杜牧和宋代苏轼的诗歌。与《全唐诗》中所录胡曾咏史诗对比,发现仅5首为《全唐诗》所有,其中还有出入,余者全是伪托。比较而言,《列国志传评林》中引用的19首胡曾的诗在《全唐诗》中都可以找到。^[8]胡曾咏史诗明代已为童蒙读物,冯梦龙以胡曾为旗号咏史,不采用《列国志评林》本中的胡曾诗歌而凭己意议论,应有“新编”的努力和出版发行时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历史名胜处的咏史诗多可确查,这是发挥了诗歌的佐证作用。如七十九回孔子绝粮处为开封府陈州界桑落的厄台,引用了北宋春秋学家刘敞的七言绝句,刘敞长于《春秋》,其春秋学著作《春秋权衡》对春秋三传褒贬善恶的标准进行权衡与比较。常熟齐女墓处引用了明代经学家张洪的七言律诗,张洪为常熟人,曾任《永乐大典》的副总裁官,通晓经义,对《诗》《书》《礼》《易》《春秋》均有诠释。这亦能说明冯梦龙知识背景的构成。在叙西施事时,他大量引用了文人诗歌,如唐陆龟蒙、罗隐咏西施的诗各1首,宋人杨备诗2首,王禹偁、杨万里、范成大、刘寅的诗各1首,元人高文度诗2首、萨都刺诗1首,明人高启诗6首、张羽诗3首、梁辰鱼诗1首。八十一回串联众多诗歌表现吴王夫差宠幸西施的欢爱与游幸;八十三回则连用数首题咏吴亡事。对比《列国志传》相应情节处,引诗的数量膨胀了很多,如数家珍的大量使用表现出他的吴文化情结。

除了具体署名或托名的咏史外,小说还以有诗为证、后人诗、无名子等形式进行讽咏。有诗为证为43处,多呼应上文,引发议论,或进一步引申、延展,有描述性功能。以后人、无名子名义的咏史,常从后辈、时人的角度进行反思。如题署无名子的诗计4首,其中3首皆为宫闱淫乱之事生发议论,第九回和十三回针对文姜与襄公兄妹乱伦事,第一百零四回讽刺国母宣淫生子,很有些八卦心态;在九十六回咏将相和事,今昔对比地感叹“今日纷纷竞门户,谁将国计放胸中”。联系明代后期的党争状况,不难理解现实忧患。

整体来看,这些咏史诗形式多为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律诗,也有古风、歌行,旨在罗列多家看法,让读者从多角度来进行理解。

(二) 无诗之评

小说在有诗的评论之前或之后会有直接的议论与阐发。在咏史诗之前的议论相当于咏史诗前的小序,常有“髯翁读史至此”现身说法的议论,如第七回,论及公子翬兵权在手,专行无忌,逆端早已显现,却未加遏制;后来发展到密奏隐公请杀弟轨,而隐公优柔未能遏制,激成弑逆,是自取其祸。这是对胡安国《春秋传》“致桓弑君,几不早断,隐公之失”,“犹豫留时”,未能早辨的阐释。^{[3]267}第十二回,论昭公自为世子时已知高渠弥之恶,两次为君,不能及时剪除恶人,“我不制人人制我”,是优柔不断之祸。在咏史诗后的议论,多是对诗歌议论的主旨再加解说,两相配合,说理透辟。如第十二回,在史臣咏史诗后解

释“此诗言昔日宣公烝父妾夷姜,而生急子;今其子昭伯,亦烝宣姜而生男女五人。家法相传,不但新台之报也。”在讽刺的同时,也借果报之说起到警示效果。

有直接引用《春秋》经义加以阐释者。第十八回对曹沫劫盟事的议论:“要盟可犯,桓公不欺,曹子可讎,桓公不怨。此所以服诸侯、霸天下也!”直接引自《公羊传》,推崇桓公信义。小说还在议论后特意交代“诸侯闻盟柯之事,皆服桓公之信义。于是卫、曹二国,皆遣人谢罪请盟。”如五十六回,因于奚有救孙良夫有功,卫侯欲以邑赏之,于奚自恃其功,请赐“曲县”“繁缨”,而二者为诸侯之制,这是大夫的逾礼之求。小说高度概括了《左传·成公二年》引用的孔子正名论:“惟名器分别贵贱,不可假人,卫侯为失其赏也。”六十七回叙蔡景公私通儿媳,世子般潜伏内室,趁其通奸砍杀景公,以暴疾讨于诸侯,自立为君,他对般“父不父,则子不子”的做法议论道:“般以子弑父,千古大变;景公淫于子妇,自取悖逆,亦不能无罪也。”在宗法制度下,虽然弑君杀父罪不容诛是社会的共识,但宗法伦理是上下相对的,淫而不父的景公也是罪有应得。不通礼义之旨,则伦理失序、道德失范。须以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但法易见,而礼难知。对于礼义精神深切著明的讲求一直是《春秋》之教的大宗,也是后世学者通古今之变以期经世致用的内在精神。以宋儒、后儒为名的议论,多出自胡安国《春秋传注》。如第六十九回,叙楚灵王诱杀蔡侯于申邑,并号称代天行讨弑逆之罪,“宋儒论蔡般罪固当诛,然诱而杀之,非法也”。蔡般弑父已是十三年前的事了,可见楚子欲图其国,不为讨贼,“而又挟欺毁信,重币甘言,诈诱其君,执而杀之,肆行无道,贪得一时,流毒于后”^{[3]35}。而且楚灵王本身便是弑君自立的,根本没有资格讨罪。“以诈济贪,无讨贼之功,而只启倾危之祸。”^{[9]999}七十三回,叙公子谒、余祭、夷昧、季札兄弟四人迭相让国和公子光、吴王僚兄弟争位相残事,冯梦龙采纳《公羊传》推崇季札“不受为义”“不杀为仁”之意,叙自吴王僚被弑后,季札耻争国,居延陵而终身不入吴国、不与吴事,其让国高风为时人推崇。同时,又引胡安国议论:“季札辞国生乱,为贤明之玷”。冯梦龙在《春秋定旨参新》中亦指出:经贬其辞国之贤,是望其中道。乱生是因夷昧既卒,然后吴王僚越分而立,光必争于前,致争弑祸兴。关于季札是否辞国生乱,前人多有争论,唐独孤及评论相当严厉:季札让国以致“错命于子光,覆师于夫差,陵夷而不返,二代而吴灭。”^[10]明人张凤翼(1527—1613年)《谭谿》载,有人认为季札应承夷昧而传之于公子光,可免僚光骨肉相残,“上以称寿梦之意,下不失子憾之节”^[11]。胡安国引导我们从本质上理解季札辞国的动因与意义。毕竟,季子出使在外时夷昧卒,待其返国时,僚已为君,光已弑僚,祸乱已生,不可挽回。假使夷昧卒,僚不为君,虚其位以迎季子,他未必不受。“季子乱生而辞国,非辞国而生乱。”^[12]辞国是源于他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观,是对礼制的坚守。对此,冯梦龙并列了褒贬两种观点,供读者辨析反思。

有托名髯翁的无诗之评,其议论处不失新意。如小说九十六回叙蔺相如两屈秦王时,认为秦人攻城取邑,“列国无可奈何,一璧何足为重?”相如是担心秦王欺赵得璧便小觑了赵国,将来难以立国,倘索地索贡,不可复拒,所以特意借此使秦国知赵国有人。历来盛赞蔺相如胆识、气节者居多,认为蔺相如完璧归赵无益、渑池会非良计的观点亦大有人在,如宋代理学家杨时(1053—1135年)认为秦强赵弱,社稷安危之机,不在璧之存亡。而“以孤单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廷”,危如一发千钧,实在冒险;渑池会上“挟万乘之君,蹈危事”,并非完全之策。王世贞(1526—1590年)在《蔺相如完璧归赵论》中也指出秦欲诈取和氏璧,还未处心积虑以之为借口吞并赵国,赵国唯在弃璧时向秦王剖析以城易璧、以璧易信的恶果,则可避免秦国不与城。蔺相如已经予秦璧而复夺之怀归,只会令秦国占理且招来杀身灭国之灾。完璧归赵且赵得保全,纯属侥幸。^[13]冯梦龙则强调了蔺相如在弱国背景下进行外交的底线原则与良苦用心。

对于富有争议性的人物和事件,他除并列诸种评价,还会模糊化处理。^[14]第四十七回写秦穆公以人殉葬一事,后人多有不同看法:有人以为秦穆公死而弃贤,并不明智;有人认为这是三良感恩的志愿,并不能怪秦穆公。小说中并列了两种意见。宋伯姬囿于礼教葬身火海的事,向来有两种评价:或以为迂腐,或以为贤德。《左传》襄公三十年客观叙述,未嫁为女,已嫁为妇,说共姬只是拘泥于女子的礼制——女子无保傅不下堂,而不知妇人可以权宜行事。而《公羊传》《谷梁传》《淮南子·泰族训》都极力颂扬伯姬的美德,《公羊传》赞伯姬依礼行事,“不见傅母不下堂”。《列女传》赞:“伯姬心专,守礼一意,

宫夜失火,保傅不备,逮火而死,厥心靡悔。”冯梦龙在第六十七回,仅言“国人皆为叹息”,并未具体言明是迂腐还是贤德,这便是模糊化的处理了。

这些无诗之评比咏史诗更清晰、直接地呈现出善恶褒贬态度与价值取向。在《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中,常于史实后直接引述司马迁的观点,或是引述史臣的评论,多为文言语体,与叙事内容缺少融合度,且不够简约凝练。而《新列国志》中托名史官史臣的史论针对性很强,语言简约通俗晓畅,尤其注意对于标志性的史事与人物结合经传进行重点阐释,体现了经学家的素养和立场。

“借言作断”作为冯梦龙将春秋学理与小说创作结合的一种方式,不失为跨越春秋经传与通俗小说藩篱的有益尝试。他借此融合经史,藉由小说实现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的大众教化,使通俗小说的地位和经史同流,打破了神圣经传与通俗小说的界线,提升了列国小说的品格。

[参 考 文 献]

- [1] 冯梦龙. 新列国志[M]//《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 古本小说集成: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2] 傅隶朴. 春秋三传比义(下册)[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 [3] 王雷松. 胡安国《春秋传》校释与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4] 余邵鱼, 编集. 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M]//《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 古本小说集成: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5] 郑振铎. 中国文学研究(上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6] 胡万川. 冯梦龙生平及其对小说之贡献[D]. 台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73.
- [7] 朱彝尊. 经义考:第一百六十九卷. 刻本[M]. 德州:卢氏,1755(清乾隆二十年).
- [8] 李小菊. 叙述者与吟咏者——论历史演义与咏史诗[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4).
- [9] 冯梦龙. 春秋定旨参新:卷二十四[M]//魏同贤, 主编. 冯梦龙全集:18.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 [10] 独孤及. 吴季子札论[M]//毗陵集:卷八. 抄本.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
- [11] 张凤翼. 谭谿:卷中. 刻本[M]. 明万历年(1573-1620).
- [12] 张尚瑗. 公羊折诸·卷五:何贤乎季子让国也[M]//三传折诸. 写本.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 吴楚材, 注. 吴调侯, 选编. 古文观止注评[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 [14] 李寿菊. 《东周列国志》研究[D]. 台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1.

The Method of "Borrowing Words to Make a Judgment" in *XinLieGuoZhi*

Peng J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of *XinLieGuoZhi*, Feng Menglong used the method of "borrowing words to make a judgment" in *Zuo Zhuan*. On one hand, he integrated the theory of Chun Qiu into the discourse of characters, reflected the truth of history clearly and openly, and implied the judgment of right and wrong. On the other hand, he used the mode of "JunZiYue" in *Zuo Zhuan*, and made satire as a bearded man, a bearded immortal or a historian, to express his own ideas, or copiously quoted authoritative works to add connotation and interest with comments with or without poems. He tried hard to integrate the Confucian classics with the historical biography, and realized the mass education of Confucian morality and ethics through the historical novel, so as to improve the character of popular novels, which established the exemplary significance of *XinLieGuoZhi* in its evolution of the novels.

Keywords: Feng Menglong; *XinLieGuoZhi*; discourse; historical essay and criticism

[责任编辑:孟西]